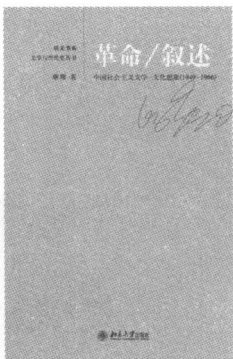


知识、经验、“当代文学”与“政治”概念

——关于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的知识批判

王 进



在“八十年代”亦归知识档案时,一个关于“中国阐释”的知识化过程似在加速行进,而另类现代性论证始终为理论前沿。其中,前三十年的“当代文学”,为之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并确立起自身在知识场域、而非一般文学史上的位置。这意味着某种当代生命的养成经验,正处于知识、理论的提升和转换中。无疑,其间必然存在经验的遗漏与遮蔽,并因此形成知识与经验之间的流动。但可能,这一流动恰印证了一种原初意义上的知识论——经验作为知识的起源^①。它意味着一种基于“当代”经验的“当代”知识传统的成立。故而,表明这一流动域的存在,不仅可以批判今日知识状况,而且能够探索建立该传统。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革命/叙述》,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②,为之提供了平台。它试图还原呈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整体结构和运动过程以及其中多重的逻辑缠绕”(第3页),实际却展开了一个征引广博、繁多的知识场域。在其中,一反此前文学、文化维度的阐释,“十七年”文学恰恰以其概念化写作之超大概念,获得了“阶级政治”/“政治”的完全意义。这一“概念”的极度增值,使得该著的知识运行实际进入了一个普遍的政治论域,可能反遭“政治”的辩驳。进而言之,它意指与当代生存经验构成最大紧张的“政治”概念,从“当代文学”中浮出,甚至带动了一种“为政治正名”的理论意向。因此,虽然该著具有鲜明的左翼立场,但本文主要在知识论、而非事关“左”“右”的价值论层面展开。

一、另类现代性论证中的“当代文学”

“中国阐释”注定是理论的困境。承担另类现代性论证的“当代文学”,最能显示西方理论的强大输送如何作为知识的条件。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没什么比这一特别适合表征50—70年代文学、文化性质的语词,更能表明其中的困境与突围。事实上,经过近二十年的理论旅行,“中国问题”已跨越地缘政治和单一的民族国家视野,趋向“内部”与“外部”的贯通。所谓“外部”,即“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强大的扩张力和毁灭性诱惑中解释社会主义的困境”;“内

部”则“从作为历史主体的‘前现代’民族”“不可遏制的表达的必然性……非西方的想象逻辑和符号可能性”；“解释作为‘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学的兴起”^③。正是鉴于“当代文学”的如此负重，《革命/叙述》可成为今日知识状况的一个表征。某种意义上，它完全实现了上述贯通内外的理论期望。

以“十七年”文学关于“创造世界”的“乌托邦”想象，确立其世界性的“未来主义”价值面向，是该著的至高立意，包含鲜明的现实批判态度。然而，这一跨越时空的历史视域之建立，必然与当代思想、理论分歧产生重重纠葛。历史呈现与知识何为，这也正是蔡翔的方法自觉，所谓“当代文学六十年，实际已成为一个战场”（第1页）。全著论述因此进入一个更深的理论内化过程，既要面对现有阐释及其历史凭据，又因依托今日愈益整体化的知识和理论，而引入种种现代性论述。正是关系的不断重构推动了论述，给该著带来繁复、绵长的面貌和篇幅。而“想象”，不仅指示“十七年”文学的价值，而且是该著理论方法本身。这种重叠，因可能的价值投射，更使该著的知识构成及运行条件值得探究。

首先要探究的，正是其中心价值结构。它包含在全著绵延展开，局部意义往往含混、矛盾的大容量知识论述中。清晰可见的是其另类现代性视野：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所谓“革命中国”，既区别于“传统中国”，更异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现代中国”。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它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拒绝。正是在此意义上，“十七年”文学以其关于民族国家、及更具超越性的阶级国家的世界性想象，成为该著总题中的“社会主义文学”。关切则在“下层人民”以“平等”为核心的“尊严政治”诉求及其社会实践。这在“劳动乌托邦”论题下的赵树理小说解析中获得最大确证。如1946年的短篇《地板》，其叙述方式即政治辩论，涉及“土改”中土地与劳动的关系：创造粮食/世界的，是地主出租的地板，还是租佃者的劳力？在小说中，这个关于劳动神圣的现代理念，进而涉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问题，转化为政治“法令”与中国传统“自然”之“情理”的辩证，并得以合理解释。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表述的内在支持及“劳动乌托邦”社会图景的想象。蔡翔以为，这一“劳动”的革命性理念，不仅超出了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范围，在中国，更是直接颠覆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统治关系的传统意识形态。它要求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仅使劳动者拥有政治经济的合法地位，更获得阶级的尊严。所以，中国革命就是“尊严政治”的实践，而“革命中国”也将以阶级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为最终指向。社会主义文学，则是伴随的文化革命、以至人类文化根本转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第225—229页）。

这一“劳动乌托邦”论述，可谓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中心价值和内涵。但显然，该著理论依凭与其说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如说“下层”所意味的“民主”在世界现代史上天然的、也是抽象的正义。因而，另一重要论题“动员—改造”，作为对“十七年”文学总体叙事结构的发现，就必然触及更为具体、特殊的意义层面。事实上，这论题贯穿全著，是为“劳动乌托邦”以至“革命中国”的价值确证，更是还原呈现社会主义“历史的整体结构和运动过程”的方法依托。按其论述，这一叙事结构的形成，正与“土改”、合作化等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重组同步，因而具有政治文化的运动特性，“改造”即其实质（第41—43、73—75页）。换言之，“动员—改造”作为实在的社会政治结构，已转化为文学文本的潜在叙事结构。正是通过该结构在多个层面的存在样式及其中各运动要素的分析，形成文本、历史，尤其文本之间的多重互文，“十七年”文学展示出丰富的涵义。比如，在国家—地方关系中，动员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地方以各种方式、形态进入国家政治，另一方面则为国家对地方的征用、监督和有效统摄。如地方“风景”的文学再建中，当民间伦理转化为政治话语时，民族话语必将受到阶级话语的监督：谁的国家？蔡翔

以为,正是下层劳动人民视角的引入,使之得到阶级和民族话语的双重支持,“本土”的“风景”方得完成,如《红旗谱》等小说(第30—32页)。再如,《创业史》式的国家故事里,承载传统伦理价值的村庄带头人,较之现代政治产物的干部(第102—103页),更起到基础叙事作用。而《山乡巨变》等小说中,地方群众经过改造或是自发参与,成为国家的主人,则已表现人民政治的想象(第93—99页)。该著中,这些论述多重反复,证明“下层”作为结构运行的内在合法支持,同时也建立起一个以劳动/下层/阶级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因此,必有一些要素作为价值的偏离者处于结构的较外部。这表现在以下问题的论述中:青年作为“新人”的政治主体建构,其私人领域的爱情、性等要素的动员和征用,及在重述革命历史、建立新的文化传统中读者的改造与建构等。该著最终围绕“技术”与“物”,集中呈现社会政治实践中的现代性冲突,作为社会主义,实亦上述价值体系的危机。如科层、官僚体制对群众的排斥,消费产生的阶层差异,个人欲望及日常生活领域的失控等。这些都是“革命中国”的威胁,导致了后来的阶级斗争。但这并非社会主义文学的终止,相反,其理论意义可延伸至知识转型的“八十年代”及当下,足为“正典”。质言之,在“革命中国”的现代性视野里,作为后三十年历史笼统证词的“技术”与“物”,实则危机形式全面预示于社会主义文学。因此,该著有着当代文学史框架,而“十七年”文学也在政治维度上获得了全新意义。

正是这一文学文本的充分意义而非习见的理论背景,构成了《革命/叙述》的论说力。从以上简介可见,仅在“危机”部分,凸显今日典型的现代性理论轮廓。但此处的知识应对显然不足,因为“动员—改造”的根本危机,来自劳动价值体系的建立,质言之,来自该著隐在的核心架构“劳动—改造”,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中心价值与确立途径,二者形成目的—手段关系。显然,这不仅是一个价值冲突的意义架构,而且已经指向当代历史与经验的巨大存在。后者作为历史的未明,必然使得知识运行中的“劳动”与“改造”,趋向价值的内在交接。而所谓“危机”,亦必由此延及对此规避的该著论述本身。这正是考察该著“想象”的基点。

在《革命/叙述》中,“十七年”文学的大概念,如“劳动”、“动员”、“改造”,负荷如此全面的正价值运行,实在于今日已然贯通“世界”/“外部”的知识平台。如上述“风景”、“科层”、“消费”等词虽属偶露,却能产生强大的理论联想力,从而近乎隐喻。事实是,种种现代性论述、说法如此贯入,以致全著论述近乎意识流的绵延。正是这一隐喻式联系的庞大知识平台,使得“十七年”文学的政治属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背景——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在“革命中国”这一现代性理论高度上的展开条件。质言之,它使得“阶级国家”自然高于“民族国家”,从而带来突出的政治视角及对“十七年”文学的深度切入。而该著繁复的理论面貌,即是这知识条件的反映,并由此区别于一般有着鲜明立场、观点及知识来源的同类研究。细察之,其论述建立于“十七年”及延安文学文本全面细读的基础上,故不重于宏大理论架构,但亦非以论带史式的个案研究。相反,所有具体的文本细读,都先已转换为一种理论力量,因此文本皆呈分散、间接的表现,进而消隐习见的理论框架。但显然,这一转换的动力恰来自上述大量隐喻式的理论应用,并最终将“十七年”文学推向了论述前锋。由此成就了该著方法上的真正特点,即其结构方式:概念本身的高度统合性。在此,一系列出自“十七年”文学文本、迄今仍具深厚生活实感的语词,如“群众”、“干部”、“知识分子”、“文学青年”、“技术革新”等,都以纯粹概念、知识出现。它们不仅作为“动员”结构中的运动要素,而且直接成为全著章节结构的形式力量。如“劳动”一词,即统合了赵树理小说、《创业史》等,而这些作品亦可再度集于其他名下。所以,这些概念已非“十七年”文学的简单引用,而是基于文本细读的理论转换所产生的。换言之,它们已经具有概念、知识上的范畴独立性,甚至相应的“乌托邦”价值位格。

这一理论转换的发生,是《革命/叙述》的关键。无疑,它同时包含了来自“劳动—改造”的价值冲突及相左历史经验的消解。而对本文来说,正可由此分析、表明知识与经验之间的流动。当上述概念试图在今日知识场域伸张其普遍性时,首先会遭遇这样的历史省察:这些在“十七年”尚需辩证阐释、理解的语词,如“劳动”之于赵树理小说,其所指已化为日常。事实是,从思想到制度,它们仍在最大范围组织当下的公共政治生活。其中沉淀的,是几代人曾经有过的来自现实政治的生命痛感和经验。正是这经验迄今的实然存在,而非其名词的袭用及新释,支持着这些“当代”概念可能有的价值。问题在于,该著所依凭的知识条件,足以其“世界”普遍性,置换以至无视这一广大的经验存在。事实上,其理论转换的完成,只可能建立于这一置换之上。正是这一置换,形成一个知识与经验之间的流动域——显然,它在该著之外,是历史性的。因此,在以“革命中国”总体批判当下的“技术”与“物”时,不怪蔡翔未能辨察,关于“资本”、“阶级”等词的政治、知识感觉,在当代前、后三十年已判然有别,同一语词所对应的经验,发生了全方位变异。再比较“人民”这类超级大词之于当下生活实感的概念化疏离程度,则更可体悟所谓“流动”的理论意味。很显然,它与这样一种仍在当下行进的历史变动密切相关。随着“人民”等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对应物的流散、不确定,其内涵亦开始模糊,愈难把握,从而逐渐疏离于社会生活的经验实在。而“劳动”、“动员”等即可作为“人民”的次级概念。这其中蕴含的历史序列感,正可喻以该著提及的马克思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56页)。然而,将之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描述,还是知识论上的某种确证,会导致不同的知识后果。可以想见,当无视经验变异的《革命/叙述》带动上述次级概念进入这一历史性的流动域,经受的必然是一个不断纯粹的概念化过程。正是这纯然“想象”,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的具体性及这些语词当下的实在性,处于某种消融状态,从而推动全著论述进入对“十七年”文学“创造世界”的再想象。

其结果是,这一语词系列的最终出现,并非作为说明“十七年”文学整体的关键词。相反,在于论证这些最初随同“无产阶级”意识“外部灌输”的语词本身,以其“乌托邦”的“想象”之力,如何激发、构建、成就了社会主义文学及其政治实践,从而形成“革命中国”的另类现代性。比如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一词,之于赵树理小说辩论方式的产生,由辩论而来的对“劳动乌托邦”社会的诉求与构想,所起的根本性的想象力激发作用。按此,该著进一步分析了“合作化”一词在《创业史》等小说叙事的符号化过程中引起的“劳动”概念变化。比如,“集体劳动”中止了数千年的私人生产方式和个人“发家”记忆,同时也带来“力量”的幻觉及“创造世界”的合理想象等。经过该著论述后的这一“劳动乌托邦”,完全刷新了千年来中国土地上那种几属自然、却往往饱含生之艰辛与苦感的“劳动”涵义。因此,这一“乌托邦”的叙述毋宁说是一种赋予意义或尊严的命名行为。然而,恰是那种自然性质的“劳动”,不仅在赵树理时代,也于今日仍然保持着更为深沉的生活实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赵树理小说中与传统的“生活世界”(第241页)相连的“情理”范围。事实上,这一沉淀千年的“劳动”苦感及其意指的人之根本匮乏,足以证明作为现代政治手段的大规模“劳动改造”何以可能。而在此更有意义的是可推论,这些“十七年”文学创作,同样处于知识与经验之间的流动域中。其历史状况,可从《创业史》中“新人”梁生宝与“中间人物”梁三老汉之间迄今未定的文学史意义差别来指证。再上溯,则是40年代赵树理小说中的“劳动”一词,已衍化为《创业史》虚构的“新人”形象。不难理解,在《革命/叙述》中,恰恰是高度概念化的“新人”诞生,赋予《创业史》以“当代”品质。而这一标准不仅适于此类符号式人物,也适于符号本身。正如区长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所起的结构性作用,使得《小二黑结婚》这样大团圆的旧形式小说不再是传统的通俗文学(第148页)。

总之,知识与经验之间流动域的显明,使得《革命/叙述》写作本身与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处在了同一历史序列。一个不断推动当代的生活实感、经验朝向纯粹概念、知识,并经受其反向作用的过程。不同在于,该著知识构成的质与量远超“十七年”,并需应对两个时代的经验变异。而概念、符号甚至机械化思维这些自始即受文学标准严格评判的创作现象,在这历史性的大转换中,获得超过文学维度的意义阐释。该著因之获得了此前另类现代性论证所不能获得的。仅其“阶级国家”的世界性“想象”,即在逻辑上越出了“中国阐释”范畴。

二、“想象”的知识状况与错位的政治感觉

最能表征今日知识状况的,莫过于“想象”一词。其与多种“共同体”之间的高度耦合,足以描画近二十年的知识运动轨迹。《革命/叙述》中,“想象”居于绝对理论中心,辅以“符号”、“形式”等词的频现,已构成一种语法。来自知识场域的足够支持,不仅使“劳动”、“动员”等词成为意义自足的概念,而且使“十七年”文学特以“符号的想象力”,自然获得整体的政治视角及最终的价值完整。但显然,“劳动—改造”结构的内在冲突,无法使该著“想象”本身获得同等价值。在此,着意历史呈现的《革命/叙述》,恰恰受制于历史的未明。而本文申明知识与经验之间的流动,正是试图将思维活动本身引入历史领域,以进行知识的批判。无论如何,该著隐在的理论转换,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还原——不是事件、人物,更非某种历史整体,而是“十七年”文学文本所呈现的时代思维过程、样貌的还原。这种思想的思想,使得该著“想象”表现出思维的高强度。它可以表明当今知识者历史性的思维困境。事实上,该著对知识坐标的两度翻转,不仅暴露出“想象”与经验、历史的脱节,而且显示一种“知识—政治”的错位联体,正取代以往的“文学—政治”。

在“想象”的地图上,文化研究无疑是一个起点性的知识坐标。上世纪90年代初,它曾经作为“方法”而在“当代文学”中最先获得实践,并终于引发整个研究范式相对“八十年代”的转变。影响甚著、被《革命/叙述》称为具有方法的革命性及“中国阐释”解放力(第4页)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④一书,可为标志之一。历史维度的重申与“现代性”视界的新变,使得该方法早已跨越学科而成为一般的理论思维,推动形成了今日相对主义的知识场域。然而,这也就越发显出“方法”转变之前“当代文学”之二元对立。另类现代性论证则正以此为基,成为它最重要的阐释路径,并将“当代文学”引入知识场域。的确,鉴于此期中国作家文化构成的巨大变化,作为民族主体的农民及其深厚完整的文化形态开始全面展现的历史情境,那些看似机械受制于二元对立的文学文本,可能恰因其思维痕迹的高度可鉴,及由此而来的触目的语义空白,再发新义。1993年的《再解读》即以阶级、民族、女性、民间伦理秩序等话语的输入,全景呈现了语际的纵横交错。由此打开红色经典中以“民族国家”为指向的巨大意识形态场域,同时给出突破二元对立、重绘文学图景的可能。至2010年的《革命/叙述》,则可谓有一个从语际到思维的纵深推进。其间的理论路途,按该著描述,即从“民族国家”/“现代中国”走向“阶级国家”/“革命中国”(第4—5页)。而所谓知识坐标的翻转,亦见于此。参照1993年出版的另一同类著作^⑤,则更清晰,在社会主义文学的“形式”、“话语”、“象征”的现代性阐发中,其“民族”显然高于“阶级”。这一翻转,不仅显示了今日知识的无穷累积及贯通“世界”之势,更量度出以“话语”为起点的“中国想象”已经离地的高度。当然,亦表征思维水准的大幅提升。在《革命/叙述》的历史还原中,“十七年”文学呈现如此丰富的意义图景,以致隐现当时的思想活动样貌及生命质感。如以下论述:相对不完美的“真人真事”,“本质化”叙述更为震撼观众内心,

有塑造自我主体的“镜像”效果(第192—193页)。而给无论如何都显苍白的前三十年文学输入意义,已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严峻课题。在此重要的是,“当代文学”没充当材料、注脚,而是前所未有地居于思想、理论的中心。但也因此,须对其“想象”背后的理论转换,予以监察和批判。

以下事实更加说明,这一转换得自今日知识情势已达某一翻转节点的内推力。正是贯通“世界”/“外部”的知识平台,使得“无产阶级”名下的“十七年”文学,从起点上就可如此定位:创造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观察世界的叙事方式”、“对话世界的政治能力”及“如何讲好‘他人的故事’的叙事能力”等(第15—16页)。在此,“叙事”与“政治”对接,如上述赵树理小说的辩论方式,显示了“十七年”文学整体的高度,并且是相对“文学”的理论、思想的高度。因此,从一开始,这一文学整体即能进入论述中心,并逐渐获得自身的理论架构力。尽管一般论述都可凭“现代性”高台而实行文学文本的理论、思想化,但限于“内部”——“外部”尚未如此贯通的知识条件,总要受制于既成框架,使文本充当材料、注脚。

其中,内外连接最大的“障碍”,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的历史存在。它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立法者、创制者及其社会政治实践方向的阐明者。自然,也是总体“危机”的理论责任的承担者。站在今日知识累积的历史点上,它还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首轮阐释者。对于《革命/叙述》,它就是激发文学“乌托邦想象”的那一系列语词概念的外部灌输者。因此,对社会主义文学来说,“中马”是其价值评判的中轴,更不用说,它对当代历史及生活的全面影响和塑造。迄今,它已成就了毋需明言的“当代”生活、生命实感和经验。如对该著中的“劳动”、“动员”、“群众”等语词,即便当代知识者也很难敏感到其纯粹概念性。正是基于这一经验的广大存在,在此须提请另一个重要参照,即以“一体化”为中心表述的“当代文学”系列著述^⑥。显然,在该“当代文学”概念建构以前,所谓“当代文学”基本处于经验状态,混融于广大的生活、生命实感。此实为文化研究能够最先着陆“当代文学”,并迅速播撒知识场域的历史原因。而它与另类现代性论证路向的不同,正在对这历史与经验尽可能的照拂、而非不可遏止的理论擢升上。详尽、细致的史料铺陈与知识、文化的轻度架构,不仅留存了“当代”的总体历史氛围,而且使得“文学”、“政治”、“真实”等概念向知识场域敞开时,基本保持原有内涵。此其“文学”——“政治”之“一体”架构的真意。自然,所提供的“当代文学”图景,亦较另类现代性论证平直、单调。“一体化”论述因此成为后者批评与跨越的重要目标。然而,随着“当代文学”意义的连续输入,“想象”的不断离地,“一体化”论述愈将以其知识的审慎与节制,表明自身价值。正是以它为照,《革命/叙述》显示出另一知识坐标的翻转:社会主义文学以关于“政治”的想象,成为、超过、置换了以“想象”为本义的“文学”。而当那一系列“外部灌输”的语词从“十七年”文学中离析并升至今日知识场域,以致形成“知识—政治”的某种联体,则这一翻转最终显示的,是该著知识条件上的最大缺失——“当代文学”建构的真正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传统。

在该著论述中,恰恰是作为历史中轴的“中马”被抽离。这是彻底、整体的抽离,表现为面上的近乎未提,及相应历史气息的极为轻淡。代之以而起者,是与“外部”/“世界”连接中相当普泛的现代性知识,如世俗化、科层制等。尽管它可能恰是该著所要批判的,但“中马”的抽离使得这批判严重失力,甚至先自有着高度的认同。因此,全著的“革命中国”论证,就受制于这样一个思想层次:以这现代性知识为中轴,衡量社会主义文学的偏转、悖离、反抗程度。故而,虽有左翼政治的明确申诉,其实际论述却不脱普遍—特殊这一最大涵容的框架。事实是,在这样的“特殊”论证上,即使同出解放区的左翼作家创作,其理论重要性亦处较低等级。相比更能提供中国革命内在合法性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民作家作品,前者毋宁出自现代中国“激进的城市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浪漫想象”传统(第16页)。比如从叙事角度、态度上来说,它是“自外

而内”的。而农民作家创作则“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因而与“自上而下”的“政治”宏大叙事，更能形成思想的互补（第174页）。在此，小说家赵树理甚至展现出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深刻洞见”（第254页）的思想家形象。这也是愈益成为另类现代性论证最高典范的“赵树理的道路”在《革命/叙述》的自然归结。

问题是，这些已可预期的结论，来自历史的抽离而非抽象。它本质性地存在于该著对“十七年”文学的理论转换中。作为历史抽离的思维后果，上述细微连绵的区分，与其说是关系的架构，不如说是等级的建立，如左翼之于农民创作的理论高度差。事实是，左翼作家更作为“知识分子”的普遍指代，居全著显见的薄弱、缩略部分。然而，此处正考验“革命中国”的论者，以何等知识界面触及“劳动改造”的历史经验，进而处置其与“劳动乌托邦”思想、价值的尖锐冲突。显而易见，同样处于动员结构中，“改造”之于“群众”的意义属于绝对的政治解放，为该著反复论证之旨，之于“知识分子”，则其理论高度逐渐下滑，转入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历史合法性论证，以支持前者。一方面，论者承认“改造”引发的现实政治迫害，另一方面，则以为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获得的“殉难者”道义叙述，已遮蔽了“十七年”文学“群众”的政治申诉。而跨越已然经验变异的两大历史时空，在此出场的理论，正是今日“资本主义”批判的法宝，科层、官僚制的现代性论述。其逻辑是，现代知识必然带来的专业分工和身份等级，排斥了“群众”的政治参与，因而知识分子改造有其历史合法性（第304页）。在此，今日理论的同度证明，不仅悬空了相应的历史经验，而且导致历史感觉的如此偏移：对立于是“人民”/“群众”的，是“知识分子”而非“政治”。显然，这一历史经验的知识处置存在严重跨界，既有知识与经验之间的简约互证，又有六十年历史的直线往复。结果，其间不断产生语义的空隙，虽有今日知识积累的随之补入，终不偿论述的内在失衡。事实上，该著现代性论证的另一关键词“无理性”，已自道破这根本的失衡。作为“革命中国”的“危机”论述，它所面对的正是巨大的历史经验，尤其“阶级政治”的现实后果。然其所有的知识应对，都未出上述理论法宝。综观之，在中国革命“正当性”的繁复论证中，几乎每一可能的反证都得以述及，却始终无法摆脱“无理性”的附属说明。最终，只能以现代性的“内在危机”，收归历史经验所显现的一切“无理性”。作为全著综论，以下表述充分说明了谓之“装置”者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容纳力：“一方面在生产平等主义的革命理念，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社会的重新分层；一方面在生产政治社会的设想，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生活世界的欲望；一方面在生产集体观念，另一方面也在生产个人；一方面强调群众参与，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科层化的管理制度……”（第13页）由此完成的，不仅是“想象”的独树，而且今日知识条件下知识与经验的全面置换。此其理论转换的实质。

这里显示出知识对现实、历史边界的冲击。正是知识逻辑的失控，使得如下表述作为《革命/叙述》的终极肯定而屡屡出现：现代乌托邦的“此岸实现”（第77页），所谓“乌托邦”，更在其“群众”的“鼓动”性，而非其预言的具体内容等（第78页），颇有另起一行模糊的大概念、重组今日思想之势。上述“知识分子”问题的知识处置，尤其显示出深陷于“物”的精神凝滞。而“知识分子”在“劳动—改造”价值结构中的消失，足以暴露其中的目的—手段关系已跌向负值。这直接相关“中马”的历史抽离。正是由之而来的思想松弛，使得“十七年”文学不断趋近“外部”/“世界”的理论高台，从而放大呈现其“想象”及“政治”效能。观诸该著的理论面貌，一方面是无微不至的绵密运思，另一方面则是论述歧路的不断延展，并抛下许多未决的思想头绪。如围绕“尊严政治”，即有“承认的政治”、“德性政治”、“全能政治”、“人民政治”、“解放政治”等在各个层面、环节的逻辑缠绕中，如“动员”结构与“集权”主义（第42页）、“劳动”与“改造”的关系（第233页）等，成为最终的牵引。而问题正在这一思维上的未决性。它不仅使得关系的架构滑移为

等级的建立,而且必然导致全著为之政治申诉与辩护的特定“阶级”,最终只能作为符号存在。但这里的符号不意味着“想象”,而是事物被抽去之所以为其是的实在的支撑。质言之,它与此在、具体的阶级永不相关。更进一步,它可能以“名义”在此在、具体的阶级之上无限运动,直至僭越“阶级”一名的边界。正是这名义与实在之间不可遏止的分离,而非这名义单独的价值标高,构成了20世纪政治的本质。而造就当代中国人政治感的,亦正来自相似的“两层皮”现象,只不过对前三十年当代史的亲历者而言更为切肤。显然,这相对名义的实在,既非经验,也非历史,而属纯粹的知识范畴。因此是在这样的知识层构之间,该著的“想象”必遭“政治”概念的最大究诘。紧要之处,即是对当代生存来说,政治的感觉与知识的感觉,在此显示出高度的交集和可能的巨大错位,所谓“知识—政治”之联体。

而《革命/叙述》显示的这种有着名义与实在之分无限可能的知识构成,与确立该著“想象”中心的那一系列“外部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处于思维、认知的同一水平。它们同属西方知识谱系。正是它的楔入,带来了该著在“十七年”文学中发现的“劳动—动员”结构,如赵树理小说对“劳动”辩证法的“情理”演绎。问题在于,相对西方谱系,“十七年”文学中最能表明另类现代性的“地方”,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彻底的经验。根本上说,是与中国人生命的经验实在相连,舍此无外的“生活世界”。因此,文本层面表现出的“国家”与“地方”的相互征用、渗透,及其借助“动员”结构在文学中的庞大运动,可能最终导致的不是“尊严政治”,而是知识对经验及“生活世界”的吞噬。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即愈益极端的二元对立。而它的后果决不止于知识、文本范畴。此即本文“知识—政治”的思想所指,并使得思维、认知活动能够置于历史领域。

三、作为思想界限的“真实”概念与经验守护

以上显示出知识与经验之间三个以上的分层:名义、实在、经验等。它不仅一般地表明逻辑与历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且意味着“真实”概念的绝对存在。在《革命/叙述》中,正是这一概念的缺席,成为“中马”历史抽离的触目标志。作为涵容于“现实主义”的核心之词,“真实”与该著之“想象”形成了知识上的反照。这是就“中马”作为社会主义文学阐释者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知识基础而言。换言之,“中马”本身即是介于知识与经验间的存在,其之强大远超“十七年”文学文本,兼具历史与知识传统的特性。因此,对它的历史抽离,同时意味着一种当代知识传统的舍弃。以下从“真实”概念进入,考察该著怎样遭遇“政治”的究诘,并由此返身被“想象”所置换的历史经验。

按其论述,“真实”概念出现于“大跃进”时期的文学创作困境。它被置于“经验”、“个人经验”层面,与“理想”、“浪漫主义”相对。而这又与蔡翔关于90年代文学思想走向的判断相关——“用经验主义全面驱逐理想主义”(第254页)。显然,这一作为“经验”的“真实”,处于“想象”的较低等级。但是,“中马”历史上的“真实”概念,并非出自该著所说的作家“经验”之于“理想”表述的制约,而是源于迄今只能以“二元对立”为表达的那种近乎窒息的知识、语言生存。而这种生存面对的,正是以“群众”、“组织”为特征的现代政治实践。只有在如此空前的行动领域里,文学中那个“情理”整饬的“生活世界”之下的经验实在,才会尽显它们如何作为每一具体生命的内在连接方式。无疑,其中有着令人震撼的经验。而只有当它们震撼到无法表达以至无视的程度,才可能反过来加剧思维上的二元对立。如此,从认知到实践,形成某种循环的思维震荡,以致走向现实的破坏。而这由跨越现实边界引起的认知严重错位,才是“真实”概念产

生的语境。“阴谋”文艺的不断鉴别,即为反证。所以,按该著的论述范围、层次及左翼立场,这一概念更应当作为知识传统的核心来继承。它是至少贯穿前四十年当代文学史的“中马”内部激烈论争的理论产物^⑦。而构成这传统的另一概念,则是同步产生的“人性”、“人道主义”,出自“中马”的外部论争。事实是,如果二者不具备传统的性质,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八十年代”就无从奠基,而“人道主义”论争即其集中表达。此外,补证这一知识传统的,是“真实”、“人道主义”概念分别对应的两个重要历史标记:胡风案、“右派”。尽管“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叙述在今日显出思想的不足,但仍可提示这历史中众多具体生命的痛苦、耻辱和死亡,并且唯因其“知识分子”的名号而联系更大的生死。正是后者的深广难察,这一知识传统迄今未明。总之,无论在知识还是经验层面,“中马”所能指代的“当代”范畴,都具有不容与历史叙述/想象混淆边界的历史性。“真实”即其知识论上的首要标识。

而径直跨越这一知识传统,正是《革命/叙述》抽离历史的前阶。事实上,“革命中国”的现代性视野本身即可消除这一传统。“人道主义”/“八十年代”、“真实”/“九十年代”式的知识资源分配,使得这两个时代实际成为相对于“革命中国”的“现代中国”。只是其资产阶级现代性,在前者尚属知识转型,后者则已成事实。故而,在其逻辑延长线上,整个当代文学都处于直线退化的史观中。问题在于,如此进化论的思维界面上,将永无此在。不仅没有此在的阶级,而且没有此在的世界。正如当“正典”赋予“十七年”文学,其“乌托邦”的再实践延宕至“未来”,所谓让“少数人的鼓动变成多数人的信念”(第78页),则“现在”必为空无。换言之,“现在”只能处于现世的空间里,承担其“继续革命”的知识逻辑,所谓“危机”与“克服危机”(第365页)的更替。

这此在的消抹,“现在”的空无,对应的正是所谓“知识”与“经验”之间流动的负面意旨,推送历史转入“烟消云散”。在《革命/叙述》中,作为当代知识传统的“真实”,固然代以“经验”而在“想象”面前失去理论的优先性,“人性”、“人道主义”则更因其非知识、非理论的情感性质而遭排斥。蔡翔以为,以“人道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暴力”,多为“机会主义式的批评”(第9页)。但恰恰是经验、情感为此在世界的具体连接。因此,当这一从知识的最低相关度来理解的传统被抽离,该著也就失去了它“想象”的根本制约。最触目者,莫过于对社会政治层面的重大史实,都限定于“形式”、“符号”层面论及。比如“阶级斗争”,是为某一冲突“形式化的政治方式”(第20页);“土改”,则为“暴力”批评中“最为重要的象征性符号之一”(第9页)等。如此历史整体的“符号”化,更使得“十七年”文学漂浮于模糊的“无产阶级”世界背景,并反过来暴露该著“未来主义”“想象”的致命自缚:“八十年代”文本自足与独立的“审美”观。问题在于,以上史实都是在今日种种知识、思想、方法的网络中显现其“形式”、“符号”性,而未与“十七年”文学本身建构起任何关系。这也是迄今为止相关的文化研究从未深究的核心关系。它所直指的,即前述知识对经验的攫取,以致发生知识、文本与现实之间认知的严重错位,并导致现实世界的颠覆。

在此,循该著对赵树理创作的论述脉络,为这种颠覆提供一个非完整说明。如果说,“浮夸风”的1961年,《实干家潘永福》等小说表现出“经验”的异常知觉与强调(第254—255页),那么体现的正是这位与“生活世界”浑然一体的小说家无可替代的意义。然而,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参照,他的限度也就在此。正如该著的进一步分析,赵树理的“经验”知觉所“洞察”的,并非知识论上的二元对立,而是作为中国革命内在正当性支持的“德性”政治,在合作化集体劳动中的愈见坍塌(第255—25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出自西方汉学家史华慈的“德性”政治概念,与父权宗法制的天然联系,而非它所表现的所谓现代性的反抗、冲突特性。质言之,赵树理的“经验”知觉,无论可能包含怎样的历史洞察,都不出这一宗法社会的认知框架。即如

圣人,这里亦有血缘的大限。更直白地说,相较西方以二元对立为根本特征的知识论所具有的思维穿透力,这一来自宗法社会的视界永远限于肉眼,其认知活动只在经验而非思维领域——正所谓“大团圆”。这才是该著屡屡赞誉的,延安的政治教育即在让群众懂得“大者”、“远者”(第338页)的根由。宗法社会的道德建构,正奠基于一经验性的传统认知方式上。其恰切涵义,不是“德性”政治,而是该著提及的“生活世界”里“好人—坏人”式的伦理区分,一种肉眼识别。相应的只能是狭窄的道德谱系。因此,当这谱系与“阶级政治”逻辑对接时,该著必然遭遇“文学—政治”的联合反驳。

按其论述,上述赵树理小说的“经验”知觉所以指向“德性”评判,是基于他的这样一个问题观察:集体劳动“停止了土改后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第256页)。蔡翔因此以之为“阶级政治”的有力论据。但是,这一求诸现实的阶级斗争运动以重建“德性”政治的观察,显然出自父权的经验视野。现实中的“好人”、“坏人”已无法甄别。事实是,正在展开的“乌托邦”实践,必然伴随大规模行动所可能的一切错误和失败,包括“德性”的不树。因此,在现代政治思想中,行动的失败并不归于行动个体的道德。而赵树理的问题视野却只能指向行动者,恰与其后“阶级斗争”主纲的历史演进重合。如果说,这是作家赵树理及其文学时代的悲剧,那么,《革命/叙述》的进一步论述,则将之扩展到了“当代文学”。正是沿循这一视野,该著将此“好人—坏人”的肉眼识别,直升为现代政治首要的敌我区分概念的内在支持(第240页)。由此,不仅在知识与经验之间发生了最大的混淆,以致与“政治”概念形成最严重的反驳,而且恰恰道出了走向敌我区分之极端的社会主义文学作为文学的失败。

正是在文学失败的意义上,以“人道主义”探讨当代文学六十年“土改”书写的未明,并试图证之于史实本身,就是合乎当代知识传统的。尤有意味的,是质询作家赵树理在残酷批斗场景描写中独有的自然主义眼光^⑧。对此,《革命/叙述》以士绅结构的现实崩溃及作为“弱者的反抗”的阶级政治之正当来回应(第9页)。但关键在于,土改运动的实质并非“阶级斗争”。置于20世纪世界革命背景,仅以其数百万人集体死亡数^⑨，“土改”即可成为现代政治研究的独立议题。无疑,即使仅按政治经济学标准,死亡者中可能作为“阶级”的“地主”寥寥。正如该著提及的历史情况是,相对人口之众,可分的余地无多,因此这场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树立“阶级”意识(第44页)。显然,“阶级斗争”在此仅存名义。它意味着整体处于贫穷状态的群众,被推向人性考验的极端政治条件之下,所谓“你死我活”。正是这一政治条件在40年代的形成,属于“政治”概念的终极追问。可想而知,这名义与这名义实行之间的思想脱节须何等大,才能席卷如此巨量的生命。其中的“人民”成分,是“革命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解释的。它只能指向超阶级的人性的波谲云诡,属这土地的千年深渊。而关于这一名义实行的历史刻度,相对左翼作家笔下群众场面“暴风骤雨”式的“风景”模糊,正是叙事自然、平缓的赵树理小说,为之留下了父权宗法制的清晰记录。从上述质询者列举的长篇《李家庄的变迁》中可见,一方面,党作为公正化身与村公所宗族式腐败,同处旧有的“德性”量度,另一方面,则是宗法的受制者们对“外部灌输”的阶级、革命话语的真诚焦渴,明确显示这话语的神谕性质。在此,话语的宣讲,不仅使话语者沐于光明,而且话语的具体内容也在听者内心难言的慰藉中逐渐模糊、消失。这也正合《革命/叙述》关于“乌托邦”重在“群众”之“鼓动”的论断。因此,当“土改”成为宗法制内的“坏人”惩治,则这位小说家的自然主义眼光,即出自外来神谕下的天经地义。这里显示的,正是作家赵树理与“五四”传统及中国革命视野相交相离的地平线。而当这一“好人—坏人”的狭窄道德谱系,与现代政治的敌我区分,显示出从经验、生命肉身,到概念、知识、神谕的如此空旷,毫无知识传统的实在支撑,则这条地平线也是当代思想的一条边界。无疑,在这广阔的知识论域

中,最当记取的,是酣饮神谕的语词经验。这语词底下的血迹验明,将破坏“当代文学”图景的一切圆融,而“真实”能够作为当代知识传统的开端。

所以,只有置于历史领域,思维、认知活动本身才会显示至高的道德、伦理性质,更何况当代政治论述。在此,《革命/叙述》超越历史之外的“想象”,实际将理论、思维的困境,引向道德的根源。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随着近二十年大规模的理论引入,是妥协、服从还是拿来、创造这一精神自问,在知识的运行中愈益隐退。与此同时,则是西方新出不迭的现代性理论,循其彻底自我批判的知识传统,越加显明“现代”是针对第三世界、殖民或后发国家的构造之物。由此展开的不仅是愈益广袤的全球化前景,而且这理论天然微妙地包含“弱者”的道德预设。从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到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至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沿循这些“现代性”路标,足见今日知识场域上的“中国”,已跨越第三世界,从世界体系中突起,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而《革命/叙述》大量隐喻式的理论应用及“革命中国”虚幻的世界性发现,不仅反映今日拔地而起的知识话语和“想象”的丛林,且因彰显这“弱者”的道德危机,成为自我的深层写照。它为“政治”的“正名”,则可预示“当代文学”作为理论的耗尽与终结。以“一体化”论者的领悟,今天,之所以挽留仅发生在中国大陆一段文学事实的“当代文学”概念,只是为了等待一个倾听的契机。20世纪那些“掉落地狱底层”,却“没能生还”或“从此哑然无言”的人们的声音^⑩。而对愈益倚重西方理论的另类现代性论证来说,这样的声音将意味着,自身言说从此只能站在辩诬的位置。

① 此意可粗略表述为:经验/个别—知识/共相,其中自有基于感觉、经验的不断抽象、概括、理论的双向流动过程,由此形成知识。所以还原到原初意义来谈,是本文试图最终触及“当代”知识的“起源”/“传统”问题。自然,这已非简单的知识论域,其涉及之广,可参考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等。

② 2010年10月、2011年6月,在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该著的讨论会(详见《蔡翔演讲综述》,http://chinese.pku.edu.cn/artDetail.jsp?channelArtId=650;《蔡翔〈革命/叙述〉讨论会召开》,载《文学报》2011年7月7日);另有论文如王葱葱《如何“叙述”“革命”》、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均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王鸿生《重建文学与政治的对话》(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1日)等。此外,作为与该著理论对话的一个切近背景,可参考蔡翔、张旭东主编《当代文学60年回望与反思》(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为2009年6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研讨会论文集。

③ 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3—244页。

④ 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再解读》。

⑤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⑥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的概念》、《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 从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到80年代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为高峰的“人道主义”论争,皆是“中马”历史上起迄性的理论事件,足见其“真实”的核心所在。

⑧ 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该文长约三万字,对六十年来涉及“土改”的重要小说进行了系统论述。其“文史互证”方法及人道主义立场,都在作者关于现当代文学的系列著述背景下,显示出与本文所论“当代文学”更为相异的知识径路,可构成更大的问题域。

⑨ 统计数字参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3页。

⑩ 转引自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第121页。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颖